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希望人们勇敢地站在全球化风暴的中心

王辉耀

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身上。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好对此做出印证：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近期一个受到国内外政界和舆论界关注的事件，即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无疑是一个令国际社会失望的决策。

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已就加强环保、扩大合作，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达成共识。这项协定不仅是178个缔约方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还会对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奉行“实用主义”而作出的选择，表明特朗普放弃了奥巴马及希拉里奉行的“软实力”外交战略。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境况及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在特朗普政府要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个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真正的反对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里可是权力的集聚地。加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此外，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也已经开始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也可以说，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

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协定》。

可以与“大自然母亲”抗衡的便是“人性之贪婪”。然而，就算是美国的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进而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的子女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用整整一页的广告去说明，苹果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总裁们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如今，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总统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未感到束手无策。我相信，加利福尼亚等各州将继续发展新能源；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继续与世界合作，投资开发新能源。

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咨询了身边的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事实上，时至今日，他在身边依旧没有配备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们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在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

但是，我相信，在当今社会，市场势力和社会权利不容小觑。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

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但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这将使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变革失之交臂。

王辉耀：面临当前快速的科技发展，各国纷纷调整政策，以维持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各国均以自身利益为重，甚至以邻为壑，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损害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基。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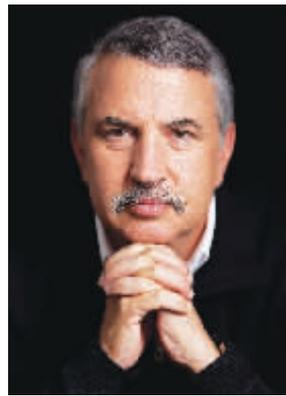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也愈加完善，社会上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打破了在美国拥有中等技能就能获得高薪收入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州

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已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程度持平。然后，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从田纳西州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到达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新型技术的发展而繁荣壮大。由此可见，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前总统克林顿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切实从中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而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也此起彼伏。您在《世界是平的》

(下转11版) →



自2016年以来，美欧社会的内部阶层分化加剧，内向转换的趋势明显，全球化面临近40年来最大挑战。作为中国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邀请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53—)来到北京，与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从全球化的新趋势、世界秩序的重建、全球化给个体生活带来的改变等方面展开了对话。

弗里德曼是美国国内较早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专业人士。他2005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已成为全球化这一主题的基本读物。

← (上接9版)

1905年仁济医馆华人董事、海上富商徐润的续室陈夫人去世，“临终遗嘱，尽出其余蓄以一万元捐助仁济医院”，徐润谓其夫人“治家严肃，待人宽厚，自奉俭约，乐善不倦，接三党以诚抚子女，以恩邻里戚族，莫不交相称颂”。以为夫人将钱款捐出是“可谓能识大体，一视同仁者。余诚失一贤内助也”。徐润夫人的捐款被仁济医馆用来建造一所女医院。1906年仁济医馆为其树碑：

古尊徐雨之观察夫人陈夫人，即信今肄业英国恶斯佛大书院，超候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

居沪上五十余年，与医院比邻住居英租界山东路二百六十五号。素知医院中施医诸善举。蒙施大惠，慨捐洋万元，助建女医院经费。慈云虽逝，德荫当爱。于落成之日敬勒贞珉永昭盛德。耶稣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医院事立。

1907年1月24日仁济医馆之“女医院落成”，“英租界麦加圈仁济医院添女医院一所，系由徐雨之观察夫人出资建造，定于今日四点钟行落成，董事朱葆三观察等特邀沪上中西官绅来院观礼，以志盛举”。

华人士绅在医院的培育与影响下，慈善的意识逐渐深入，

1886年，上海地方绅士登报帮春甫之妇求平安：

英商仁济医馆创设多年，中外同仁孜孜不倦，施诊就医不知凡几。董厥事黄春甫先生去除礼拜外，每日必躬亲诊治，无论内外诸症，按骨割毒均用西法炼成，外洋药水，药到病除者，洵不乏人。本月上旬，春甫先生之内人沈氏陡患时症兼之肝厥怀妊四月，春翁自用西法药水，迄未奏效，并延中国诸医，开方调治延半月有余。

中外医生都无法医治黄春甫夫人之疾，于是，这批绅士便想出以“助赈求痊转危为安”的方式，或可见受黄春甫和仁济医馆多年行善之感化和影响。

新型而正常的医患关系

讨论医患关系，是医学史和伦理学史上永恒的主题。从来医患关系只囿于医生与病者之间，好坏、优劣，只有二元的价值判断。我们试图离开病床、放下手术刀、走出医院，由另一个角度探讨影响医患关系的本质因素。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角度，是由仁济医馆的历史特性引发的思考。虽然仁济医馆由教会创办，但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由市民维持，同时反

馈这座城市，维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仁济医馆与上海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创设初期便带有强烈的社会和世俗特质。而近代医院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仁济医馆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仁济医馆在19世纪的上海创建了一个只属于仁济医馆的模式，即医院-社会-病人的医患关系。仁济医馆在服务保障上海市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时，培育了一种新型而近代的慈善理念。医院服务于社会与人群，完全有理由要求社会资助，这才是一种新型而正常的医患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